

引文格式: 贺坚峰, 刘桂宏, 杨蕴琦, 等. 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3, 17(3): 94-101. DOI: 10.12371/j.ynau(s).202211117.

# 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影响研究

## ——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贺坚峰, 刘桂宏, 杨蕴琦, 臧敦刚\*

(四川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 熟人社会以及制度缺失的中国乡土特征导致了农户人情支出行为, 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关系网络。本文通过引进农地确权这一制度建设, 利用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微观数据, 研究农地确权是否影响农户人情支出。研究发现: (1) 农地确权显著抑制了农户人情支出; (2) 通过工具变量、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 结果依旧稳健; (3)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 农地确权会对中等人情支出水平的农户产生更大的抑制作用, 且对 35 岁以上、已婚和非贫困户农户具有更显著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为正式制度影响传统农村社会提供了经验证据, 也为农地确权等农村正式制度的引进提供实践指导。

**关键词:** 农地确权; 人情支出; 制度优化

**中图分类号:** F 1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2023)03-0094-08

## The Impact of Farmland Ownership Determination on Farmer's Gift Expenditur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FS Micro Data

HE Jianfeng, LIU Guihong, YANG Yunqi, ZANG Dung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with the lack of system have led to the expenditure behavior of farmers' human relations, forming a rural relationship networ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study whether the confirmation of rural land rights affects the gift expenditure of farmers by introducing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onfirmation of rural land rights and using the micro data of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ial survey in 201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firmation of farmland right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expenditure on human relations of farmers; By mean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substituting explanatory variables, the results were still robust; 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confirmation of farmland rights would have a greater inhibitory effect on farmers with higher gift expenditure, and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families with lower age and income.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mpact of the system on gift expenditure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formal rural systems such as rural land ownership confirmation.

收稿日期: 2022-11-28 修回日期: 2022-12-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脱贫地区乡产业振兴的金融服务模式创新研究”(22CGL07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藏民生满意度持续改善机制: 基于拉萨市农牧区大型入户调查的实证研究”(719640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藏农牧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状调查研究”(22BMZ126)。

作者简介: 贺坚峰(1997—), 男, 山西吕梁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村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 通信作者: 臧敦刚(1985—), 男, 山东泰安人, 教授, 主要从事农村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Keywords:** confirmation of farmland rights; gift expenditure;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人情支出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核心特征<sup>[1]</sup>,它往往限于血缘、亲缘以及地缘关系展开交集,并逐步形成交际网络。“关系”“熟人”等具有乡土特征的概念,其内涵便是具有人情交际的乡土社会网络的形成,往往这种“关系情理化”更多地出现在制度缺失的农村社会<sup>[2]</sup>。制度完善是市场运行的基本假设,长期有效的制度化或约定俗成的契约化都会促使人们相互之间形成较好的“制度信任”。但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仍在深水期,面临诸多困难与不足,潜在的寻租与制度缺失导致规范性的制度无法形成,因此“关系情理化”的社会组织网络便应运而生。农户日益剧增的人情支出便是这一现象的突出表现。农地确权是中央政府为界定农地产权结构实施的以确权登记颁证为主要标志的改革措施,这一措施标志着土地正式制度在农村社会的引入,也为本文开展正式制度对农户人情支出影响的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

与西方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交网络不同,中国是以血缘、氏族与地缘为核心依附的熟人社会。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户面临更多传统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特别是人情支出——包括拜年、升学、结婚、丧礼等的礼金带来的支出,这一形式成了中国乡土特征最为具体的现实表现。近年来,农民人情支出水平不断上涨<sup>[3]</sup>,尽管带来了较重的家庭负担<sup>[4]</sup>,但也不可否认其为家庭带来的信息<sup>[5]</sup>、个人认同以及地位提升的作用<sup>[6]</sup>。农地确权作为一种农地改革措施,在世界各国都有所展开,但是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传统农业格局与农民社会将随着农地确权的开展产生巨大的变革,探究农地确权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是本文的首要目标;人情支出是中国农村特有的传统非正式制度,在中国已流传上千年,农地确权规范农民土地权利,赋予农民土地流转的收益,是否会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农村非正式制度赖以生存的农民社会,解释人情支出这一非正式制度是否依存于传统农地格局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一) 人情支出

一般而言,人情支出往往与社会地位挂钩,社会地位较高,人情支出往往也会较高,通常此

类人情支出被视作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现有研究已从多个维度对家庭人情支出的原因及机制进行分析,如社交网络、风险分担以及地位寻求等,但有关制度与人情支出的研究近年才有所发展。基层治理作为正式制度的一种嵌入方式开始对人情支出的合理性产生影响<sup>[7]</sup>,在正式制度之外还存在着宗族、亲缘、邻里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宗族所在扮演的角色因其作用不同有所差异,但是始终在维系农村传统的社交网络。

人情支出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现象,狭义人情支出中所指的赠予行为往往仅与经济行为有所联系,但广义人情支出中将所有具有社交属性的转移性支出都归于人情支出,通常此类行为要包含经济学、行为学与心理学等多种属性。有部分文献研究发展中国家婚姻中的彩礼现象,认为女性人口相对过剩与彩礼的风险转移机制是导致彩礼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sup>[8]</sup>。也有文献关注贫困人口的人情支出,认为贫困人口依然有部分支出用于人情往来,主要原因可能是相互攀比与传统习俗<sup>[9]</sup>。中国的人情支出往往会影响家庭的社会地位,贫困家庭尤其重视人情往来<sup>[10]</sup>。人情支出的本质在于维护和扩展社会关系<sup>[11]</sup>。也有学者认为人情支出在特定时期能够帮助家庭渡过难关<sup>[12]</sup>。如果因过度攀比<sup>[4]</sup>等原因导致过高的人情支出,容易形成“棘轮效应”,对家庭的幸福感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sup>[13]</sup>。

### (二) 农地确权

农地确权是从政策层面保障农户土地产权,明晰农地权利。学界对农地确权一直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有学者表明农地土地承包权带来的产权激励会促进农户获取金融性资源,并提升土地价值<sup>[14]</sup>;也有学者认为农地确权能够改善农户对土地投入的稳定性<sup>[15]</sup>。与农地确权关联度最大的是土地流转,已有研究明确了农地确权对土地流转具有重要的影响,且有力保障了农村土地的安全性与稳定性<sup>[16]</sup>,农地确权能够通过传导机制,激励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进而帮助农民摆脱贫困<sup>[17]</sup>。

### (三) 研究评述

现有研究聚焦人情支出的社交网络属性与社会地位提升,并围绕人情支出对农户家庭的消费

以及各类经济行为展开研究。其中多数考虑非正式制度环境下人情支出的经济属性,较少有研究考虑正式制度对人情支出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主要关注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影响。农地确权作为促进农村现代化措施的主要手段之一,其正式制度的有效性不言而喻。农地确权进一步确立了土地权利的划分,对促进土地流转具有极为显著的作用<sup>[18]</sup>。同时,农地确权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引入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基层治理的作用。农地确权措施依靠政府,由政府与村党委统一展开测量、核算、颁证等一系列措施,有效促进了基层组织在农户的权威性,也将正式制度成功嵌入农户家庭。正式制度嵌入后,农户开始逐渐产生“制度信任”,基层治理的进一步深化,也加深了社会契约化的形成与传统社会网络的崩解,间接减少了农户人情支出,进一步促进农户对社会、政府以及制度的信任感。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也在正式制度的引入后进一步拓展,契约关系网络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发展。

## 二、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该调查自2011年起,每两年调查一次,包含个人、家庭、省区市以及社区等四个层面的数据。依次对2011、2013、2015、2017、2019年五次的调研数据进行整理,发现农地确权相关数据仅在2015年家庭金融调查中有所涉及。2015年数据调查包括全国29个省(市、区),基本覆盖调查样本的个人基础信息、家庭金融与负债信息以及土地相关信息,该数据具有良好、广泛的代表性。

### (二) 变量描述

#### 1. 被解释变量

人情支出。在家庭问卷部分询问农户给非家庭成员的现金与非现金的具体金额,包括节假日支出、红白喜事、教育、医疗、生活费、其他及捐赠或资助。在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时,总样本中农户人情支出平均值为4114.5元。为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同时取农户人情支出的对数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

#### 2. 解释变量

农地确权。农地确权通过是否取得农用土地

(包括耕地、草地、林地、园地以及其他农用地)的土地经营权证作为代理变量。在有效样本中,2015年取得证书的农户占44.8%。

#### 3. 控制变量

基于已有文献,并受限于数据可得性的条件下,本文研究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影响时,不仅考虑核心变量,还需要考虑影响农户人情支出的其他因素。主要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地域特征。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家庭年消费、幸福感、受教育年限、党员身份、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家庭特征包括户口类型、是否贫困户等。地域特征主要指农户所在地域,运用东、中、西部进行划分。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据表1可知,样本中有44.8%的农户完成了土地确权,7.4%的农户为党员身份,14.2%的农户属于贫困家庭,样本整体的受教育年限平均为6.7年,性别比例适中,平均年龄为54.1岁,中青年样本居多。上述数据表明,样本整体具有代表性,符合统计学基本规范。在数据匹配、剔除核心变量缺失、剔除异常值与极端值之后,最终获取有效样本量16289个。

#### (三) 模型选择

参照现有研究与数据特征,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进行检验,具体设定形式如式(1)所示:

$$\ln Y_{payment_i} = \alpha_0 + \alpha_1 tenure_i + \alpha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1)中, $payment_i$ 代表个体*i*的人情支出; $tenure_i$ 表示个体*i*农地确权情况; $X_i$ 表示控制变量,包含个人、家庭与地域特征的控制变量; $\varepsilon_i$ 为随机扰动项。模型设定过程中考虑多重共线性问题,经过检验,个人特征中仅有年龄与年龄平方有多重共线性,删除后不影响总体回归结果,其余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VIF值均低于2,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 (四) 特征事实分析

通过对农地确权与农户人情支出之间的散点(图1a)进行分析,发现农地确权与农户人情支出呈现负向关系,且拟合并进一步控制年龄变量后之后,存在趋势相对一致的线性变动态势,验证了农地确权与农户人情支出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为更直观地明晰农地确权与农户人情支出的关联,对分仓散点图进行分段回归处理(图1b),低人情支出的拟合线斜率为正,中等人情支出的

表1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人情支出)	农户人情支出取对数	16289	7.695	1.216	0	10.146
农地确权	确权=1, 没有确权=0	16289	0.448	0.497	0	1
性别	男性=1, 女性=0	16289	0.500	0.500	0	1
年龄	公式: 2015-出生年份+1, 单位: 岁	16289	54.129	13.041	18	106
ln(家庭年消费)	家庭年消费总额取对数	16289	10.26	0.906	5.886	13.816
幸福感	非常幸福=1, 幸福=2, 一般=3 不幸福=4, 非常不幸福=5	16284	2.396	0.874	1	5
受教育年限	没有上过学=0, 小学=6, 初中=9, 高中/中专/职高=12, 大专/高职/本科=16, 硕士=19, 博士=22	16289	6.667	3.827	0	22
党员身份	党员=1, 非党员=0	16288	0.074	0.262	0	1
健康状况	非常好/好/一般=1 不好/非常不好=0	16289	0.752	0.432	0	1
婚姻状况	未婚=1, 其他=0	16289	0.020	0.14	0	1
户口类型	农业户口=1, 其他=0	16289	0.934	0.248	0	1
是否贫困户	贫困户=1, 非贫困户=0	16289	0.142	0.349	0	1
区域划分	东部=1, 中部=2, 西部=3	16289	1.934	0.802	1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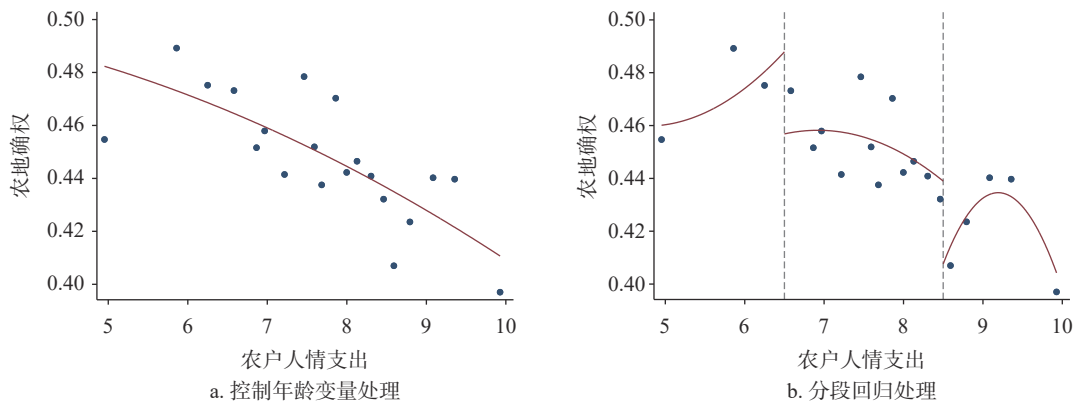


图1 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影响

拟合曲线为负, 高人情支出的拟合曲线为U形曲线, 说明农地确权与农户人情支出之间可能存在多种关系, 需进一步的实证回归进行验证。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式(1)的基准回归结果在表2中体现。(1)~(4)列分别展示了没有控制变量与逐步加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区域特征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在回归过程中, 核心解释变量农地确权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控制变量逐步加入后, 结果依旧稳健, 说明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具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

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渐加入, 可以看出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中年龄、家庭年消费、幸福感和健康状况对人情支出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 农户人情支出越多, 符合传统农业社会对老一辈农户根深蒂固的影响; 家庭消费越高, 人情支出越高, 家庭消费代表家庭的生活水平, 生活水平越好的家庭, 人际网络越宽广, 因此人情支出越高, 符合一般规律; 幸福感越高的农户, 人情支出越高, 幸福感来源于自身社会地位与他人认可度的提升, 而人情支出对农户社会地位的提升符合理论规范。随着农户健康水平的提升, 会显著

表 2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人情支出	人情支出	人情支出	人情支出
	OLS	OLS	OLS	OLS
农地确权	-0.084*** (0.019)	-0.081*** (0.019)	-0.081*** (0.019)	-0.057*** (0.019)
性别		-0.009 (0.020)	-0.008 (0.020)	-0.003 (0.020)
年龄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家庭年消费		0.051*** (0.011)	0.050*** (0.011)	0.045*** (0.011)
幸福感		0.023** (0.011)	0.024** (0.011)	0.026** (0.011)
受教育年限		-0.001 (0.003)	-0.001 (0.003)	-0.003 (0.003)
党员身份		-0.017 (0.038)	-0.019 (0.038)	-0.016 (0.038)
健康状况		0.076*** (0.023)	0.073*** (0.024)	0.059** (0.024)
婚姻状况		0.014 (0.069)	0.017 (0.070)	0.007 (0.069)
户口类型			-0.025 (0.039)	-0.034 (0.039)
家庭贫困			-0.031 (0.028)	-0.013 (0.028)
区域划分				-0.090*** (0.012)
常数项	7.733*** (0.013)	6.99*** (0.141)	7.037*** (0.150)	7.301*** (0.153)
观测值	16289	16283	16283	16283
R-squared	0.001	0.003	0.003	0.007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促进农户人情支出的增加，可能的原因是没有疾病或慢性病的困扰，农户更可能付出更多的金钱与精力去投入人际交往，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满足必要的精神需求，这也是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基本假设。在家庭层面没有显著的控制变量抑制或促进农户的人情支出，但在地域层面，发现划分中东西部会显著影响农户的人情支出水平。具体而言，随着地理位置向西部偏移，农户的人情支出受到的抑制作用就愈发显著。中西部相比于东部，经济环境整体较差，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营商环境都不如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虽然随着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战略的开展，经济发展有所起色，但整体而言与东部相比仍有所差距。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寻租现象的产生，尤其是中国制度大环境缺失的情况，在东部地区经常可见礼金攀比与盲目跟风的现象，因此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而言农村人情支出水平也会更高。

### (二) 稳健性检验

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抑制作用。可能会由于模型检验过程中存在的遗漏变量或者模型本身的反向因果关系导致内生性问题。在实证过

程中，农户人情支出可能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模型量化无法涵盖所有方面，可能会存在家庭疾病、农户劳动力转移、户口流出等因素无法纳入模型，导致模型存在部分遗漏变量，进而影响模型整体规范性。农地确权与农户人情支出可能存在内在联系，人情支出在某种程度上会通过非正式制度的渠道影响农地确权。

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采用 2015 年各省耕地面积作为农地确权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设定需要同时满足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与解释变量的外生性两个条件，就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而言，各省耕地面积与解释变量农地确权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耕地面积越大的省份，农地确权农户就越多，符合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各省耕地面积与农户人情支出没有直接关联，各省耕地面积依据常年耕作与新开荒的土地进行计算，与农户人情支出与否没有任何关联，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

表 3 展示了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第 (1) (2) 列分别代表 2SLS 两步法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各省耕地面积会

表3 内生性处理

变量	(1)	(2)
	人情支出	人情支出
	2SLS (two-step)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省份耕地面积	-4.55e-06*** (1.31e-06)	
农地确权		-4.030*** (1.3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69*** (0.064)	7.811*** (0.342)
观测值	16283	16283
F值	11.995	

显著抑制农户人情支出,同时检验可能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结果显示F值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中,农地确权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具有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

### (三) 异质性分析

#### 1. 分位数回归

为进一步分析农户在不同条件下,农地确权对其人情支出的影响差异,本文采取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研究。具体而言,将农户人情支出水平分为10%、25%、50%、75%以及90%的不同层面,分步回归不同人情支出水平条件下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影响,研究不同分位数中农地确权的具体影响机制。

表4是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据表4可知,农地确权会在50%分位数水平上对农户人情支出产生显著的抑制性作用,在其他分位数水平上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农地确权对较低水平人情支出的农户

缺少影响渠道,人情支出较少的农户其本身可能具备较高的社会地位,无需通过人情支出来维系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农地确权对此类型农户人情支出缺少影响机制,因此对其人情支出水平没有影响。高水平人情支出的农户,在农村熟人社会中的地位可能相对较低,需要通过高水平的人情支出进一步支持或提升其在农村的社会地位,此时农地确权与否对其人情支出已无关紧要,正式制度无法满足农户提升社会地位的需求,因此高水平人情支出的农户对农地确权基本不存在敏感性。农地确权影响的是中等水平人情支出的农户,此类型农户不追求农村社交网络中的较高地位,在人情支出方面容易受到各方面影响,因此农地确权等正式制度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类农户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2. 分组回归

不同分组条件下,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影响作用可能不同。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可能存在的分组差异情况进行检验,依据年龄、婚姻状况以及贫困与否等条件逐一分组。年龄按照35岁作为分界线进行分组讨论,35岁之前是生育年龄的最佳期限,本文以此区分不同生育年龄阶段的农户中,农地确权对人情支出的影响。婚姻状况按照未婚和已婚情况进行划分,已婚包括同居、离异、再婚以及其他等诸多情况,不同婚姻状况下,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也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家庭贫困与否涉及家庭收入与家庭支出,不同贫困状态下的农户,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影响作用也有可能不同。

表5对分组回归结果进行了展示。据表5中(1)(2)列可知,农地确权对35岁以上(含)的农户人情支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对35岁以下的农户人情支出没有显著影响。生育年龄是一道门槛,处于生育年龄以下的农户对农地确权并不敏感,其生活的主要方式不是依靠土地,土地确权对其生活没有显著影响,而35岁以上农户多依

表4 分位数回归

变量	(1)	(2)	(3)	(4)	(5)
	10%分位数人情支出	25%分位数人情支出	50%分位数人情支出	75%分位数人情支出	90%分位数人情支出
农地确权	-0.002 (0.038)	0.000 (0.008)	-0.0061** (0.025)	-0.029 (0.018)	-0.010 (0.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6.309*** (0.309)	6.908*** (0.065)	7.477*** (0.200)	8.374*** (0.144)	9.118*** (0.136)
观测值	16283	16283	16283	16283	16283

表 5 分组回归

变量	(1) 35岁以上(含)人情支出	(2) 35岁以下人情支出	(3) 未婚人情支出	(4) 已婚人情支出	(5) 贫困户人情支出	(6) 非贫困户人情支出
农地确权	-0.057*** (0.020)	-0.052 (0.074)	-0.089 (0.146)	-0.057*** (0.020)	-0.050 (0.050)	-0.058*** (0.0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7.473*** (0.131)	7.434*** (0.529)	7.78*** (1.086)	7.28*** (0.155)	8*** (0.385)	7.127*** (0.167)
观测值	15 109	1 174	328	15 955	2 312	13 971
R-squared	0.007	0.007	0.044	0.007	0.004	0.009

靠土地耕种等方式生产,对土地有所依赖,因此土地确权的引入,对其生活有所影响,同时对其人情支出也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表中(3)(4)列汇报了婚姻状况不同分组下,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影响,其中未婚群体没有显著影响,已婚群体中农地确权对人情支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已婚群体因双方家庭的搭建,相比于未婚群体而言,具有更多的人情支出,因此已婚群体中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未婚群体并无此显著影响。表中(5)(6)列对贫困与否的家庭进行了不同分组,发现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影响在非贫困家庭中具有更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贫困家庭中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贫困家庭人情支出因其社会地位、家庭收入等因素影响,相对较少,且其贫困属性意味着可能缺少土地等生产要素,因此农地确权对贫困户人情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同时,非贫困户家庭可能具有较多的土地,家庭资产相对丰富,农地确权等正式制度的引入对其生活影响较大,进而影响其人情支出。上述分组回归结果认为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影响作用,在35岁以上、已婚以及非贫困群体中更加显著。

#### 四、结论与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与“关系情理化”不利于乡村振兴的推进,引入正式制度,改变乡村非正式制度环境,强化基层治理,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行的关键,也是打破城乡分化僵局的必要手段。新一轮土地确权的开展为中国农村引入正式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本文在新一轮土地确权的准自然实验基础上,构建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

支出影响的理论模型,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的家庭与个体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随着新一轮土地确权的开展,农户获得土地确权颁证后,会显著降低其人情支出水平。回归结果显示,每提升1单位的农地确权水平,农户人情支出水平就会下降5.7%。考虑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与遗漏变量问题,采取工具变量法与替换解释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因此农地确权水平越高,农户人情支出水平就越低。

第二,农地确权对中等水平人情支出的农户具有显著影响,对低人情支出与高人情支出水平的农户没有显著影响。为更好地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影响机制,本文进行分位数回归,结果发现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影响仅在中等人情支出水平家庭中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结论表明,农地确权这一正式制度的引入对低人情支出与高人情支出农户影响作用不大,农地确权对中等人情支出农户影响较大。

第三,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的抑制作用,在35岁以上(含)、已婚和非贫困群体中更加显著。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基于已有文献选择年龄、婚姻状况以及贫困状况等条件,对模型进行分组处理,结果发现,农地确权对农户人情支出影响在不同分组具有显著性差异,35岁以上(含)、已婚与非贫困群体对农地确权影响农户人情支出,具有更高的敏感性。

##### (二) 对策建议

推动乡村振兴,强化基层治理,引入正式制度是目前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城乡分化僵局的重要手段。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持续深化土地确权制度,改善农村制

度环境。新一轮土地确权开展以来,农村土地得以有效流转,盘活了农村土地市场,也为农村制度环境的改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随着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断深化改革,土地改革的重心逐渐转移至农户身上,需要加大以保护农户利益,维护农村市场,改善农业结构为主要理念的行政执行措施,特别是借此机会稳固正式制度在农村的地位,推进农村制度化环境改革。

第二,加大制度建设,抑制“畸高”农户人情支出。正式制度的引进,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非正式制度的挤压,为更好地服务农户,降低农户因“畸高”人情支出导致返贫的风险,政府应该对农村制度化建设进行梳理,通过正式制度引导农户进行政策的人情支出,避免攀比的“歪风邪气”严重损害农户利益。具体可以通过建设培育良好的乡风乡俗,制定乡里公约等措施改进农村非正式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重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统筹兼顾。正式制度的引进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嵌入,难以真正贯彻到农户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政府应当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效结合,兼顾二者的长处,做到用非正式制度手段引入正式制度产生效果,进而推动农村“移风易俗”,改善农村制度环境。

#### [参考文献]

- [1] 田学斌,闫真.农村人情消费中的非正式制度:一个交易费用理论框架[J].消费经济,2011,27(3):85.
- [2] 樊凡,刘娟.“差序格局”抑或“关系情理化”: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反思[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2):125.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8.02.017.
- [3] 罗美娟,申小亮.人情支出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2021,42(6):47. DOI: 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21.06.005.
- [4] 刘玉飞,汪伟,常晓坤.人情支出、同群攀比与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J].学术研究,2020(6):102. DOI: 10.3969/j.issn.1000-7326.2020.06.017.
- [5] 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0. DOI: 10.3969/j.issn.1001-4608-B.2011.04.003.
- [6] 彭程,杨继东.人情还是信息:社会网络与工资决定[J].世界经济文汇,2016(5):17.
- [7] 庄天慧,胡霜,贺家欣.村主任知识化、非正式制度与农村人情支出[J].农村经济,2022(2):81.
- [8] RAO V. The Rising Price of Husbands: A Hedonic Analysis of Dowry Increases in Rural India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101(4): 666. DOI: 10.1086/261892.
- [9] BIAN Y.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3): 366. DOI: 10.2307/2657311.
- [10] BROWN P H, BULTE E, ZHANG X. Positional spending and status seeking in rural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6(1): 139. DOI: 10.1016/j.jdeveco.2010.05.007.
- [11] 张旭青,杜丽永,何伟.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人情往来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18,34(1):73.
- [12] 周广肃,马光荣.人情支出挤出了正常消费吗:来自中国农户数据的证据[J].浙江社会科学,2015(3):15. DOI: 10.14167/j.zjss.2015.03.002.
- [13] 邹宇春,茅倬彦.人情支出是家庭负担吗:中国城镇居民的人情支出变化趋势与负担假说[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3):46.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8.03.07.
- [14] BESLEY T.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hana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103(5): 903. DOI: 10.1086/262008.
- [15] SAINT-MACARY C, KEIL A, ZELLER M, et al. Land titling policy and soil conservation in the northern uplands of Vietnam [J]. Land Use Policy, 2010, 27(2): 617. DOI: 10.1016/j.landusepol.2009.08.004.
- [16] 程令国,张晔,刘志彪.农地确权促进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流转吗?[J].管理世界,2016(1):88. DOI: 10.19744/j.cnki.11-1235/f.2016.01.009.
- [17] 丰雷,李怡忻,蒋妍,等.土地证书、异质性与农地流转:基于2018年“千人百村”调查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1,18(1):151. DOI: 10.16149/j.cnki.23-1523.20200826.001.
- [18] 黄佩红,李琴,李大胜.新一轮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机理[J].农村经济,2019(5):17.